

政治智慧

历代名臣



治国方略

大连出版社

政治智慧

——历代名臣治国方略

(上)

田建民 李金善 选注译评
韩田鹿 孙 光

大连出版社

2000·大连

政治智慧

——历代名臣治国方略

(中)

田建民 李金善 选注译评
韩田鹿 孙 光

大连出版社

2000·大连

政治智慧

——历代名臣治国方略

(下)

田建民 李金善 选注译评
韩田鹿 孙 光

2000·大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智慧：历代名臣治国方略/田建民等选注.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9.3
ISBN7-80612-579-5

I. 政… II. 田… III. 政论—中国—古代—选集 IV. D6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5535号

政治智慧——历代名臣治国方略（全三册）

田建民 李金善
韩田鹿 孙光 选注译评

大连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2号)

新华书店发行
三河市科教印刷厂印刷

字数：1210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5.375

印数：0001-5000

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许文彦
装帧设计：黄华斌

责任校对：刘青 于安
宋丽

ISBN7-80612-579-5/D.22

登记号：(辽)第15号

定价：68.00元(全三册)

引 言

中国是一个对政治格外关注的国度，历史上一向有“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的分野。其中，“小人之事”是“治物”，“大人之事”则是“治人”即政治。

政治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目光聚焦点。班固在分析诸子百家的起源时曾说过：

王道既微，诸侯力政，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舍诸侯。其言虽殊，譬如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于义，敬之于和，相反而相成也。《易》曰：“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其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流裔，使其人遭遇明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才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乏，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缺取才，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汉书·艺文志》）

这就是说，诸子的学说全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斗争尖锐的产物，而其学说的根本都来自于学术与政治无法分开的殷周时期的“六经”，其学说的根本指归，都在于如何建立一种理想政治。今人刘文典更指出：“周秦之际，士之治方术者多矣。百家之学，众持异说，各有所出，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阴阳、儒、法、刑名、兵、农之于治道，譬犹榛之于盖，辐之于轮也。”而且，他们对政治的热

情不仅停留在理论的探求上,还体现在对现实政治的参与上。如孔子宣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大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为世所用的急不可耐跃然纸上。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为利天下摩顶放踵,多方奔走,其门徒更在他的授意下直接参加了宋国的反侵略战争。法家的创始人多是有成就的政治家,如商鞅主持变法,就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得秦成为西方一个富庶的强国。先秦时期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当时的思想巨匠们所奠定的思考方法、学说、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关注现实政治的精神,也为后世所继承,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传统。

汉代以后,儒家取得了独尊地位,儒者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的泛称,而儒家“入世——经世”的价值取向,也从此成为知识阶层普遍的人生方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都是这种价值取向的生动体现。甚至潇洒如李太白,在接到玄宗要接见他的消息,也不禁高兴得唱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句子来。所以陈独秀就说:“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文化学术功能被政治功能所淡化、掩盖,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学问、知识,必须而且只有附丽于政治,通过政治实践来检验其价值。因此,“学而优则仕”,投身宦海,为民请命,替天行道,就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最为规范的角色认同。当然,求得政治显达并非他们唯一的志趣,一旦“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幻灭了,传统知识分子又往往将老庄、禅佛思想作为心灵慰藉。

正因为自古以来,投身政治,渴望建功立业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潮;或者说政治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安身立命之所,具有异常神圣的位置,政治文章在中国历史上也就特别发达。可以说几千年来,凡经意仕途的士大夫(更不用说其出将入相者了),没有一个不在这方面下大功夫的。于是,历朝历

代都流传下来许多充满了各种各样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写得又十分漂亮的政治论文——我们一般称之为“政论”。

政论从其产生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道理上讲,什么时候开始了政治,有了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什么时候政论也就开始了。中国最早的典籍《尚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君臣间关于为政问题的谈话,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后来政论的雏形。如《尚书·皋陶谟》记载了传说中舜的大臣、掌握刑法狱讼的皋陶与大禹对如何实行德政治国问题的讨论,皋陶提出了“慎身”、“知人”、“安民”的主张,就是要严格地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要任人唯贤,安定民心;同时提出要顺从天意,遵循尊卑等级制度,搞好道德伦常关系;并提出了检验人是否能够从政的九种美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尚书·咸有一德》中,伊尹强调了德行统一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告诫太甲要日行新德,任官要选贤才,选择大臣要选忠良,要以善为师,虚心待人接物。自从《尚书》在汉代立为学官以来,备受推崇,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最为重要的教科书之一,其中的一些政治思想如“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等,对后世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尧、舜、禹、皋陶、夔等圣君贤主的言论、做法,更是经常在后世的政论中被津津乐道、援引不已。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出现和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旧有的上层建筑随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动而土崩瓦解。奴隶暴动、国人起义、政权更迭、江山改姓。面对这样一种异常混乱的局面,各个阶层的人都不会感到满意。于是,他们便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发表议论,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理想中的政治。而大国争霸、诸侯混战的局面,也使得君主们对治国理论的要求极为迫切。这就为诸子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面对时政,他们各抒己见,相互驳诘,在求得天下大治这一根本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孔子创立的儒学,以“仁”为思想核心,强调礼对行为的规范作用,尊崇道义,推崇教化,在乱世中为人们树立了理想的高标;墨子则主张“兼爱”、“非攻”、“尚贤”、

“尚同”、“节用”、“非乐”，反应了春秋战国时期下层民众的强烈愿望。道家在对现实政治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文明的代价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主张弃仁背义，废礼毁智，以无为而治天下，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之中。而法家则对人欲横流、争战日烈的现实政治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以冷眼观世，将人与人之间温情的面纱无情地撕去，断言人是自私的，人性无异于兽性，人与人之间不过是相互利用、相互算计而已，以此为基础，提出以“法”、“术”、“势”治国，以实际功利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其他又如阴阳家、名家，也无不对社会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政论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对于治国安邦、安民抚众、富强之道、人性人伦等为政的根本问题都进行了相当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是一个没有成见的、开放的、多元的时代，是一个为后世奠定思想基础的时代，后世几乎一切的治国理论几乎都能在这个时代找到根基。

自从秦“振长策而御宇内”，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府形成了。伴随着政治纷争局面的结束，以及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一系列统一措施，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开放的、多元的思想渐渐沉寂下来。秦代推行法家思想，实行苛酷的统治，结果二世而亡。汉初采用黄老之术，尽管取得了休养生息之功，但也产生了地方节制不利之弊。经过反思、比较，特别是汉儒的提倡，重血亲人伦、重视现世事功、重实用理性与道德修养的儒家学说被抬到了官学的高度，并从此一直处于主流地位。此后的政论，虽然因朝政和庶事越来越多、愈复杂，随之而发的议论也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说，其思想都囿于儒家思想之内，它们使得儒家的统治思想日益精深化、完善化，但较少开拓之功。

中国传统的政论在唐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首先与当政者的提倡有关。唐代考试有明经、进士两科，明经着重于儒家经典的记诵，进士着重于诗赋和时务策，而进士尤为时人所重，唐代重要官员大多出身于进士，考中进士的人非常荣耀，被视为“登龙门”。作为考试项目的策论，即根据提问，逐条对答。其内容为对时事的

议论,即论政。为了求得金榜题名,实现自己荣登仕宦的理想,士子就不得不对政论进行揣摩、练习。社会风气如此,政论的水平自然也就提高了。另外,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也对政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古代的文章写作,经历了一个由散到骈、又由骈到散的发展过程。骈文盛行于南朝,是一种讲求字句对偶、词藻华美、音韵铿锵的文体,流风所及,一直影响到隋唐。那时的章、表、疏、奏、案牘公文、往来公文仍用骈体,因为过分讲究形式的华丽,限制了思想的表达,所以多数骈文内容空洞、千篇一律、词句陈腐、令人生厌。直到“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出来,才廓清了骈文的风气。韩愈的口号是“复古”,其实就是要通过作文来宣扬儒教,号召人们写出像先秦那样密切关注现实政治、社会民生的文章。韩愈的提倡得到柳宗元等人的支持,古文渐渐压倒骈文,占据了文坛的主要地位。古文运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对形式的过分关注拉到了社会现实,而且由于一代文坛巨匠在政论领域所做的努力,使得政论在文章品格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像韩愈的《论佛骨表》,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结合历史、现实,灵活地运用古文体裁,有理有据,将佛的不足事、唐宪宗佞佛的荒谬揭示得淋漓尽致。柳宗元的《封建论》,历数各朝得失,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郡县制”比“封建制”的巨大优越性,提倡任用贤能,提倡统一,抨击了贵族世袭和封建割据等不合理现象,批驳了为藩镇割据服务的恢复“封建制”的论调。它们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洋溢着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战斗性,而且行文层次分明,论证有力,笔锋犀利,语言优美,成了后世作文的典范。

宋朝是一个多有忧患的时代。宋太祖赵匡胤虽然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却始终为边外的契丹与党项人所困扰。对外战争的一再失败,使得宋不得不割地赔款,以求得一时屈辱的和平。南宋人则在另一个更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金的胁迫下,不得不以长江为界,偏安一隅,甚至一度被逼得逃亡海上。北宋人因积贫积弱、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出的忧患交织在一起,在宋人的心灵上投下了深重的阴影。忧患使人多思,因此宋

人的议论之风极盛；忧患又使人对社会政治极为关注，激起了人们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于是又有了庆历新政及王安石变法。如何解决家国忧患？如何看待变法维新？面对强大的敌人是战是和？这些问题吸引了全社会知识阶层的注意，成为两宋政论最为突出的主题。面对相对集中的话题，人们在深思的基础上各抒己见，反复驳诘，这就使得两宋的政论在理性思考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与唐代相仿，北宋初年，又掀起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在欧阳修的倡导下，苏洵、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一批古文大家崛起，后又有秦观、陈师道、张耒等人脱颖而出，追随呼应，使古文运动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而政论正是他们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无论在思想深度上，文章技巧上，政论在宋代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像欧阳修的《朋党论》、《为君难论》，析理言情曲尽其致，文风豁达，务以理胜；苏洵的《辩奸论》老辣犀利，简劲有力，宏伟雄迈，奔腾驰骋，很有战国纵横家的风度。苏轼的《教战守策》、《刑赏忠厚之至论》、《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神宗皇帝疏》，以史为鉴，翻空出奇，随机生发，雄辩涛涛，极富腾挪变化。这些政论，不仅表现了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敏锐洞见，而且已经超越了他们所议的具体事件、所处的具体时代而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明清两代，文网日严，文化禁忌颇多。特别是清代，文字狱森严恐怖，知识分子议论一有不慎，便会招致杀身之祸。如乾隆年间工部主事陆生楠作《人生论》，称“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必愈甚。”乾隆认为这是“借古非今，肆无忌惮”，“心怀怨望，讽刺时事”，而将陆斩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震怖失色，手足无措，“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清人梁诗正甚至总结出了“不以字迹与人交往，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的经验。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力被窒息，言路被阻塞，这些显然是对政论的发展极为不利的。总体来说，明清两代的政治论坛是一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死寂，虽间或有海瑞的《治安疏》那样的惊世骇俗之文，但究竟于大势无所补。

这种局面,在近代终于有所改易。中国一向是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但却在“红毛蕃种”的进攻下一败再败,甚至被“蕞尔东洋”的小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任何一个爱国的人都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政治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同时,随着清帝国国势的衰微,统治集团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大为松动;统治者面对千疮百孔的内政外交,也不得不广泛征求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见解,允许士人对那些十分敏感的现实问题加以讨论,知识分子得以从文字狱的血雨腥风中解脱出来,“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这一时期的政论的主题是围绕着中西之辨、体用之辨等问题展开的,最终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论坛上,康有为与梁启超是时代的骄子。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一举冲破清政府严禁士人干政的禁令,对时政慷慨陈词,力主拒绝和议,恳请“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气势宏伟,皇皇大论,近两万言,表现了民族危机关头要求变法维新,图强御侮的爱国激情与力求中国发展进步的先进思想。这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由此发端,而康有为在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地位也由此而奠定。梁启超的政论文章则更有强烈的鼓动性,其文“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 1902 年 4 月致梁启超信)“至于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撼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拂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吴其昌《梁启超》)之所以如此,除了思想尖锐,内容新颖外,还得力于他所创造的“新文体”。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己维新运动失败后:“启超既亡居日本,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意,国人兢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

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在政论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任何一篇文字的写作,在其写作之时,都有着自己的理想读者。在中国的专制时代,由于皇帝一人独揽大权,“朕即国家”,所以要实现理想政治,就必须而且只有通过帝王才能实现。所以,中国古代的政论,绝大多数的理想读者都是皇帝,其发表的理想场所是威严的庙堂。传统政论的典雅、谨严,以及作者写作政论的态度,实际上都是由这一点所决定的。至近代,随着舆论的力量愈来愈受到重视,报刊出版业的迅速发展,政论的作用也就越来越摆脱了只为打动在上者的目的,转而以唤起民众和制造、影响舆论为其主要功能。梁启超“自解放”而作“新文体”,以《中外纪闻》、《时务报》等为阵地,发表政论达百万余言,正是适应这一社会需求的产物。尽管在报章上发表政论非自梁启超始,但他所作政论数量之多,影响之巨无人可比,确为奠定现代政论的主将。

在中国为数众多的政论中,奏议所占的位置特别重要。这首先是由其功用决定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只有君主专制一种,而且从历史上看,呈不断强化的趋势。皇帝处于独尊的地位,朝廷虽没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但政事的最终决定权还是握在君主一人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君主是国家中个人意志的、没有规定的、自我规定的环节,是任性的环节。”由于精力有限,更由于君主专制是人治而不是法制,所以统治难免会有所偏差。如果再遇到昏庸或独断的君主,则政局的不稳定、社会的动荡乃至江山的改姓易帜都是极有可能而且也确实屡次发生的。这些,都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寻求补救的措施,而听取众议。在这一点上,虽然一般的政论也可能通过种种渠道影响政治,但终不如奏议来得更直接些。在历史上,开明的君主对臣民的谏议多有重视,而且也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夏禹、商汤、唐太宗时期的美政,便与他们勇于纳谏有关。相反,夏桀、商纣、周厉王拒谏止谤,最终落得

身死国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了臣民之谏议的重要。

其次,奏议是写给帝王看或说给帝王听的,而要以一篇文字或一番谈话来打动帝王之心,当然是相当不易的。对于绝大多数臣子来说,都希望能够在劝谏君王的同时保全自己,因此多数奏疏都下笔极为谨慎,其文思虑周到,论述明晰,条理清楚,务求能开启帝王心智,引发其深思。如欧阳修的《朋党论》,便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委婉细密的说理廓清了弥漫在朋党问题上的迷雾,所以当后来有人诬指范仲淹、欧阳修为“朋党”时,仁宗根本就不加理睬。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分析了宋建制百年没有什么人的动荡的原因,更指出了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内忧外患,指出“天助之不可常恃,人事之不可怠终”,勉励神宗“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坚定了神宗变法图强的决心。这些奏议,不仅对时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都是极好的议论文章。更有一类作者,出于一腔忠君爱国的情怀,激于道德的义愤与对社会的责任感,置生死于度外,直指君王之失,更在道义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如海瑞上《治安疏》,直指嘉靖帝一意玄修以求长生久视的虚妄,于伦大节的亏缺,任用奸佞的失误,甚至不惜引用“嘉靖者,言家家皆净无财用也”的俗语来警醒世宗。海瑞也知道此疏必定会触怒世宗,招来杀身乃至灭家之祸,于是在上疏前便为自己备下棺木,遣散了僮仆,诀别了妻子,待罪于朝。其他又如夏桀时的关龙逢,殷纣时的比干,吴王夫差时的伍子胥,南朝时的郭祖深,都为后世称颂不已。在这些人身,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高尚人格表现无遗,如鲁迅所言,他们都是民族的脊梁。这些人的霜雪之节与他们的奏疏,谏言交相辉映,标炳史册,为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财富。正是由于奏疏的重要历史作用、文章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后世有深远意义,所以我们在选择篇目时,将绝大的篇幅放在了奏议上。

政论,自然都是讨论治国方略、为政之道的。但为政之道,其所涵括多矣。在中古,举凡君德、圣学、孝亲、敬天、郊庙、治道、法

祖、储嗣、内治、宗室、经国、守成、封建、仁民、务农、建官、选举、求言、慎刑、理财、外戚、近习、征伐、任将、马政、赋役、御边，等等等等，无不在政论的范围之内。而且即使是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人提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决措施。故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多样，驳杂纷呈的。在浩如烟海的政论中，究竟选取哪些人书，不同的选家，自会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取舍标准。本书选收政论的标准主要有二。一是围绕历史大事件，如宋代所选篇目多侧重于王安石变法、对辽金夏的战和之议等；二是关注其对后世的影响及理论意义，如柳宗元的《封建论》，耶律楚材的《论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许衡的《论时务五事疏》等。与此同时，适当注意名人名篇，照顾少数民族作者。所选篇目，则按时代先后进行排列。自先秦至清末，共收入政论二百余篇，涉及作者一百余人。

本书既名为《历代名臣治国方略》，所收人的政治论文自然大都出于历朝历代的名臣之手。除此以外，我们还将几篇表达了帝王本人治国思想和方略的文章与诏书，作为“附录”排于书末。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对中国传统政论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本书内容由政论原文、注释、译文、评析四部分组成。原文选自二十五史、《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昭明文选》、《全唐文》、《全宋文》、《全辽文》、《金文最》、《经世文编》、《历代名臣奏议》及几十种文集、别集。原文全部做了分段、标点，一律改为横排简体。注释以帮助阅读为目的，主要为作者、生僻字、典故、人物、制度、引语出处等，其中作者置于第一个注释处，如几篇作者为同一人，只在其首篇加注。译文采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务求通达晓畅。评析视政论特点各有侧重，中心围绕着政论的时代背景、来龙去脉，影响与文风特点、写作技巧来进行。

编选这部书的意义，从大的方面说，研究前代历史的兴衰得失，是为了作为今日的借鉴，可谓“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另外，传统政论中的不少思想、哲理和治国方略至今也还具有旺盛的活力，值得我们汲取，很可以拿来以为今日之用。从文学上看，

许多政论实际上也是很优美、典范的论文。阅读它们,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提高鉴别欣赏能力乃至文章写作技巧,都是很有益的。

我们编写的这样一部书,初衷是务求对读者有所裨益,但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误舛谬之处自然很多,尚望读者、方家匡正其失。

刘志琴、宋书通、韩宁、王亚培、张艳、李连生、郝福和、颀斌、焦晗、杨虹也参加了本书部分撰稿工作。

编 者

1998年7月25日

目 录

引 言	(1)
谏周厉王宣民使言	〔周〕召公虎 (1)
谏齐桓公重用管仲	〔春秋〕鲍叔牙 (4)
向齐桓公论治民	〔春秋〕管仲 (7)
向齐桓公论统计	〔春秋〕管仲 (11)
向齐桓公论管制市场	〔春秋〕管仲 (21)
向齐宣王论交邻国	〔战国〕孟子 (25)
向滕文公论治国	〔战国〕孟子 (28)
民为贵章	〔战国〕孟子 (32)
天 论	〔战国〕荀子 (34)
五 蠹	〔战国〕韩非子 (45)
向秦孝公论变法	〔战国〕商鞅 (69)
向秦孝公论强国策	〔战国〕商鞅 (74)
向秦孝公论开塞	〔战国〕商鞅 (82)
向秦孝公论建立法度	〔战国〕商鞅 (89)
向秦孝公论徕民	〔战国〕商鞅 (94)
向秦孝公论法治	〔战国〕商鞅 (101)
向秦孝公论法的实施	〔战国〕商鞅 (106)
向赵武灵王论易服	〔战国〕公子成 (113)
察 今	《吕氏春秋》 (117)
谏秦王逐客书	〔战国〕李斯 (122)
劝行督责之术书	〔秦〕李斯 (128)
过秦论(上)	〔西汉〕贾谊 (134)
大 政	〔西汉〕贾谊 (142)
贤良对策	〔西汉〕晁错 (158)